

袁义达 杜若甫 编著

中華姓氏大辭典

袁義達 杜若甫 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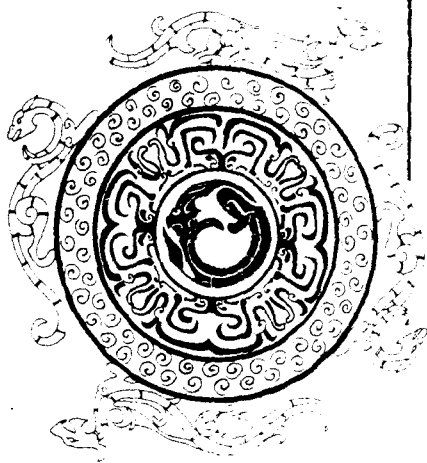
教育科學出版社

袁义达 杜若甫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中华姓氏大辞典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姓氏大辞典/袁义达,杜若甫编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

ISBN 7-5041-1477-4

I. 中… II. ①袁… ②杜… III. 姓氏-中国-辞典 IV.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842 号

责任编辑 赵连杰

责任印制 尹明好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编:10008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43.5 字数:1700 千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 3 000 册 定价:98.00 元

序

季羨林

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巨著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

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决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

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北朝胡姓考》的序里说：

“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

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

此读者自知之，无得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着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决不止限于寅恪先生所说。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

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决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而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宗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所附的资料中，有一篇关于崑姓与崑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的“崑”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岳飞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着，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成了“崑”字。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勿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上面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姓氏研究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联系呢？

我认为，联系是密切的。这个认识只是我不久以前才得到

的,通过这一次阅读本辞典的部分稿子和资料,又进一步加深了。先让我举几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现在我看了袁义达同志带给我的材料,里面讲到,中国汉族姓氏中李、王、张三大姓高踞榜首,鼎足而三。李姓占全人口总数的7.9%,王姓7.4%,张姓7.1%,三者加起来共占22%多,有几亿人口。这几个大姓再加上同名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军”,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出版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上面谈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本书的自序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与姓氏有关的问题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我读了本书部分稿子以后的诚恳的希望。

两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谨严细致的科学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探讨方面上；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的谨严准确的自然科学的学风。我们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学风。这是我的又一个诚恳的希望。

我写到这里，读者读到这里，我们必然都要想到两位作者和出版者，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独具慧眼，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他们肯而且敢在今天出版界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出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大辞典。我现在向中国史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等，郑重推荐这一部大辞典，它会给你们的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除了共同的感激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特殊的感激。我在开头已经谈到，张在德同志和袁义达同志代表作者找我写序的时候，我认为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使我踟蹰难决，我甚至不理解，何以找到我头上来。我内心里不但毫无感激之意，而且还颇有点抱怨。然而，到了今天，材料看完了，序也写完了，仅仅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忽然恍然大悟，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我现在又感到，光用“感激”二字都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了。

我的序就写到这里。

1991. 1. 3

序

陈 原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有两个科学机关差不多同时对汉民族的姓氏作抽样统计,测定汉民族姓氏的数量结构和地理分布。这两个科学机关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遗传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简称“语用所”)。

遗传所从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作为“生物学标记”的群体遗传学特征;语用所从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父系标记”的姓氏用字状况。两个研究所都得出很有价值的数字,并且都写成专文收载在我主编的《现代汉语数量分析》(1989)一书中。我认为,全部测量数据应当从速印行,因为这两项数据虽略有不同——这是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规模不同引起的——但它的意义和作用,显然已大大超过原定目标,它对于各个有关学科(例如人口学、优生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史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史学等学科)和有关部门(例如民政、公安、邮电、人事、信息统计等部门)都有实用价值和一定程度的理论价值。

可以指出,这两项数据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汉民族姓氏频率和姓氏分布的成果,其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这些成果在很多方面打破了原来的传统观念,例如现在还使用着的姓氏不止一百家,而是在一千家上下(遗传所在样本为 537429 人中发现了 1066 个姓氏;语用所在样本为 175000 人中发现了 737 个姓氏)。又例如姓氏的地理分布和姓氏所占比例,也同传统观念不尽相同(遗传所测定包括李、王、张三大姓在内的 19 个大姓,累计频率达 55.6%;语用所测定包括王、陈、李、张、刘五大姓在内的 14 个大姓,累计频率达 49.48%)。两个测定数据不约而同地向社会提出了同姓率问题。更严重的现象是当代人名用字偏少而导致的同姓同名率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注意并且要采取符合社会心理的方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如果将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论证,那就肯定会得出更有影响或者说更有意义的结果。所以遗传所两位专家在完成上述课题的基础上,用大力气搜集了古往今来的汉和其它民族姓氏资料,编成这部词典,使我们对姓氏的探索扩大了视野。从纵向看,它收罗了自汉民族形成后曾经出现过的姓氏(其中当然包括了现代已湮没了的姓氏,从外族移植过来的姓氏,因政治原因改了写法的姓氏等等);从横向看,它蒐集了大陆以外各大洲华人即炎黄子孙所曾使用过的姓氏。可以说,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词典,是汉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能收集到的姓氏大全。我说的“大全”,不过就其主观意图上说的,我想编者决不敢自夸这部词典就没有一点遗漏。但即使如此,出版这样的工具书,也确实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虽然没有定量分析(对历史上的资料很难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样的资料也是各个有关学科、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所盼望已久的。

我不想也不能评论这部词典的长短,我只知道编者的工

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至于这成果究竟达到如何的学术水平,我更不想置论,但有一点却不可不提:它是充分利用了海内外学者们的成果编成的。真正的科学成就都有继承性,当然还有创新性,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编者在自序中提出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用字的发展倾向,那就有赖于海内外读者诸君的研讨和判断了。

1991年5月于北京

作者自序

在上古时代，以氏族为单位分散居住的原始人群间交往甚少，因此并不需要姓，只要每人有一个名字就可以了。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群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氏族间为了相互区别，慢慢有了氏族的名称，这些名称就是姓的起源。氏族的名称往往和他们的生产、生活、居住地、图腾及某些特征有关。

中国的姓和氏本来是不同的。姓早在史前时代已出现，但由于当时并无文字记载，无法确切地查考。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姓在母系社会即已出现。“女”、“生”两个字合起来是“姓”字。所以在当时姓是标志每一个人的母系的。至今还知道一些古老的姓，如姬、姒、姜、嬴、姚、妫、媯、媯、妊、妣、妃、好、妣、嫫等都带有“女旁”，也可作为佐证。因此，当时姓是母系遗传的。古书记载中“同姓不婚”和姓是用以“别婚姻”等，都指同一母系的人互相不能通婚。

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出现了父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名称，在开始时称作氏。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约二千多年，在这一相当长的时间内，母系遗传的姓与父系遗传的氏同时并存。后来，由于父系越来越重要，原来由母系遗传的姓逐渐地也变为由父系遗传，或者不复存在，于是姓与氏合

一，都由父系遗传，或称作姓，或称作氏，或称作姓氏，反正都已是一个意思了，因为都标志每人的父系。

中国的姓氏起源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而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姓氏的起源都相当晚。例如在法国和东欧的犹太人直至19世纪初才有姓。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还算比较早就有了姓，在公元815年已有1182个氏族名称(姓)了。

姓氏进化的一般规律是原来人数少的姓(俗称“小姓”)逐渐消失，而人数多的姓(俗称“大姓”)的同姓人越来越多。中国由于姓氏出现早，进化时间长，加之人口最多，所以在世界上中国的同姓人最多。例如，根据1982年对全国二分之一随机取样的调查结果，并加上台湾省1967年的统计结果，姓李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达8000多万人。其它9个姓所占汉族人口比例依次分别为王7.4%、张7.1%、刘5.4%、陈4.5%、杨3.1%、赵2.3%、黄2.2%、周2.1%、吴2.0%。该调查取样相当少，结果不算很精确，但目前尚无全国的其它随机取样统计数字。

人数少的姓逐渐消失，人数多的姓同姓人越来越多，其原因不仅因为大姓氏族比较强大、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优越等而繁殖速度较快，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来并不是该姓的人，通过被皇帝或主人赐姓、或者本人主动改姓，变为姓大姓、即在社会上原来已占优势的姓。而在中国，大姓越来越大的最重要原因却是几千年以来，汉族以外的一些民族，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往往采用汉姓，而且自称为汉族，甚至在修家谱时还追溯到历史上汉族中该姓的一个显贵人物作为自己的始祖。这种现象在1950年以前，一直普遍存在。今天，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但已不再改称自己为汉族了，只是采用汉姓而已，因为今天少数民族采用汉姓，不是为了提高

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为了便于与汉族交往。由于过去与现在少数民族在采用汉姓时,往往采用那些在汉族中比较占优势的姓。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已占优势的大姓的同姓人的数量。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畲族、瑶族中的蓝、盘、雷等姓,回族中的海姓,保安族中的冶姓,傣族中的刀姓等在汉族中原来并不多见。

从1982年全国二千分之一随机抽样调查的297个县(市)所得的姓氏资料(57万余人)、123个县(市)志办公室所提供的最新姓氏统计资料(约5700万人)以及320本(篇)书及文献中,我们共收集到中国人古今汉字姓氏共11969个(不包括三千多个异体字姓和异译汉字姓),其中单姓5327个,复姓4329个,三字以上的姓2313个。总数比收集古今汉字姓最多的1969年台北出版的《中华姓府》(7720个姓)多4249个。但由于中国大陆至今尚无全国姓氏的全面统计资料,仍可能有一些罕见姓氏遗漏。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汉字姓,由于缺乏资料,又来不及去详细调查,一定尚有不少遗漏,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补充。

对文献上曾经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姓氏,我们进行了大量收集工作,尤其着重收集了南北朝、西夏、辽、金、元、清时的突厥、鲜卑、党项、女真(满洲)、蒙古族以及明、清时的黑龙江流域诸民族的姓氏资料。少数民族姓氏的资料少而零碎,其汉译的译法也很混乱,一姓多种汉译在文献上普遍存在。历代姓氏专著仅收录少数民族几个著名的姓氏。1911年以后出版的姓氏书基本上不收清满洲八旗姓和蒙古八旗姓。台湾王素存先生著的《中华姓府》(1969年台北出版)为近代收姓最多的姓氏专著,正文收录6363个姓,而辽、金、元、清的1357个姓氏仅作为附录附于其书后。而本辞典则力求把历代中国各民族

的全部姓氏均收入辞典正文,对一姓多种汉译的姓氏作了初步的校勘与核查。但一定尚有不少遗漏与错误。

文献中出现的有些姓氏在各类字典中都查不到,这类姓氏有可能是笔误、刊误造成的讹字,但其中许多因缺少足够的资料而无法考证,目前只能仍把这类姓氏收录在本辞典中以备查阅研究。

姓氏应是可遗传的,即可传给下一代。只要符合这一条件的,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姓氏,我们也一定收录。国内少数妇女及海外华侨在结婚后,在自己的姓名前又加上丈夫的姓,如:“黄惠英与陈××结婚后,其姓名成为“陈黄惠英”。但“陈黄”并不算一个复姓,因为这相当于“陈门黄氏”,她的孩子仍姓“陈”,而不姓“陈黄”。

本辞典中姓氏的拉丁字母拼法是编者在国外工作期间以查阅有中英对照的华人人名录、会员录、电话簿、广告,以及直接询问本人等多种方式收集的,尚不完全,尤其对居住在欧洲、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的华侨尚缺乏全面的调查,因此还需要在今后补充。国外越南人、朝鲜人所采用的汉字姓的拉丁字母拼法,有时与中国人同姓的拼法不同,如朝鲜人“朴”译成“Park”、越南人“阮”译成“Ngyuen”,本书均未收录。

在调查收集古今汉字姓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过去从未记载过的姓氏,共有几十个。如龠,音狐,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均有分布;昞,音仄,在山东、台湾等地均有分布;蒧,音施,在广西合山有此姓;霰,山东沂源、高青地区有此姓;崑,音亚,在辽宁、安徽等地均有分布;赖陈,广西北海市有此姓;张包,在江苏有此姓;虾,云南弥勒县彝族有此姓。

有一些姓氏虽然古代文献曾记载过,但因为非常罕见,以后也未再有记载,一般认为已消失了,我们却重新发现了它

们。例如，皓，春秋时有此姓，今辽宁沈阳仍有；皖，春秋时有此姓，今安徽、浙江等地均有；众，春秋时有此姓，今北京、河北等地均有；拳，春秋时有此姓，今浙江余姚仍有；旅，汉时有记载，今北京、台北等地均有；号，汉时有记载，今浙江、台湾等地均有；栝，汉时有记载，今北京仍有；吐，南北朝时有记载，今山东、台湾等地均有；叱干，唐时有记载，今陕西彬县仍有；重，明时有记载，今四川泸州、成都等地均有；尸，明时有记载，今山西、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均有；口，明时有记载，今甘肃仍有；毕，明时有记载，今台湾新竹仍有；蒯，明时有记载，今江苏武进仍有。这些姓氏可称为姓氏中的“活化石”。

姓氏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它是识别每一个人父系的符号（目前极个别人姓母亲的姓，只能看作例外），但是中国汉族人口多而姓氏少，目前全国汉族使用的姓氏约 3600 多个，其中最常见的 19 个大姓的使用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 55.6%。因此同姓同名、或姓的字不同音相同的人特别多，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不便，甚至造成麻烦。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谨提出以下意见：

1. 姓氏不要简化，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有关停止使用的异体字的联合通知和 1964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部有关简化字使用的联合通知中就已提到姓氏可以不简化。但这些年来“姓氏不要简化”这一重要原则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姓氏仍普遍简化，以致相互混淆，造成混乱，例如：雲与云、修与脩、種(zhǒng)与种(chóng)、後与后、塗与涂、萬与万、於与于、乾与干、穀与谷、黨(zháng)与党(dǎng)等；或者随意简化，例如：傅、詹、潘、戴、蔡分别简化成付、占、泮、代、菜等；前面一个姓经简化后，就与后面一个姓完全混淆了。结果等于改

了姓。

2. 提倡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上给自己或子女改姓,以增加中国姓氏。可以通过以下六种途径改姓:①采用一些新的单姓,如钚、氦等字都可以用作姓。②重新使用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但现在已消失的姓氏。这样的姓至少有几千个。③采用新的复姓,包括把父母双方的单姓合在一起作为孩子的复姓,这对于独生子女特别适用。④采用三个字以上的姓。⑤已采用汉字单姓的少数民族恢复其原来的姓,然后汉译。这样不仅体现出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也可以使我国文化更加丰富。⑥引进国外其它民族的一些姓。以后随着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也会增加。

本辞典的两名作者都是从事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自1985年起,才开始了汉族姓氏频率的研究,因为姓氏频率研究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用现代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姓氏频率(即各个姓氏的人口比例),以研究不同地区汉族人群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和融合等。自1986年起,我们开始编写本辞典,这是因为姓氏频率研究要求我们对姓氏具备更丰富的知识,而编辑辞典过程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同时我们对收集研究姓氏这一工作也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我们想用自然科学中重视实际调查等方法和严密简明的写作方式来编写一本姓氏辞典,作一次新的尝试。

虽然本辞典的编写工作是从1986年正式开始的,而第一作者早在1969年就已对姓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收集姓氏从未间断过。因此,当1985年底出版界的朋友张在德先生(原四川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现四川天地出版社副社长)提出希望我们能写一部有关姓氏的辞书时,我们考虑到中华姓氏文化